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朗宇法师 主编

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

楼宇烈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B948-52
L787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中国
与
佛教
人文
精神
楼宇烈 著

主编 朗宇法师
副主编 圣凯道坚 黄夏年



◎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楼宇烈著.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08

ISBN 7 - 80123 - 554 - 1

I . 中… II . 楼… III . 佛教—文集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4244 号

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

楼宇烈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策 划: 黄夏年

责任编辑: 霍克功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3.75 印张 309 千字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书 号: ISBN 7 - 80123 - 554 - 1/B·175

定 价: 27.80 元

楼宇烈

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



总 序

从佛法本身来说,教、理、行、证的修学次第,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有重义理、重实践等区别。但是,作为佛弟子来说,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充分、完整地表达出来,如“阿毗达磨”虽然着重于论证“法”的自性、定义、关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谛理的现观”,最终归于修证。那么,重修证的佛教,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重视佛法的适应性、实效性,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如初期大乘经典以“般若”、“三昧”、“解脱门”、“陀罗尼”、“菩提心”等作为中心,来表达从发趣、修行、证入的历程。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

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高僧传》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诵便属于义解门；而习禅、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都是属于实践门；最后一科“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傍及世间经书、治世语言、礼乐文章等，无不兼通。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论，在“述而不作”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而且，这些佛教义解僧，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论著，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视主体的体认、自己身心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禅、净的流行，在这种“简单”、“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过接触梵文、巴利文等东方语言，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消化佛教的教义。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观性、纯学术性，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佛学。19世纪后期，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

与发达。随着“西学东渐”、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的辨伪，“大乘佛教非佛说”的讨论，“佛教非宗教非哲学”之辩等。同时，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人生佛教”运动，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对来说，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像吕澂、陈垣、汤用彤等，皆为一代学术大师。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于是，培养人才、弘法、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

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了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突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显示其优胜之处。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

总
序

集

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

因此，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探索其前后延续，彼此关联的因果性；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以了解过去，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佛代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以文化阐扬佛法，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现代化的权巧方便。”现代中国佛教界，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通过转化与变通，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

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989)，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嘉定十五年(1222)宋宁宗赐名“宝庆讲寺”。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尊重学术、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一直讲法不辍。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宝庆讲寺记》。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宝庆寺观音殿记》。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高高地耸立在寺里。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日常事务、早晚功课、坐禅念佛等之外，勤于读书，研究经论。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参访名山大寺，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因此无论到哪里，我都会带上一些书，也经常会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已经蔚为大观，感到欣慰。

但是,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而且现有书籍之中,难免良莠不齐,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见。有感于此,我和道坚法师、圣凯法师、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于是,我们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

朗 宇

2003年6月21日于宁波宝庆讲寺

总
序
佛
教
论
文
集

楼宇烈

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



前 言

在这本论文集中,把我近二十年来所写的有关佛教方面的主要文章,都已收录进去了。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应学术会议或编集专题论文集之约而写的,内容上没有多少内在的联系。但在这些文章中,多少还是能反映出一些我对佛教历史、教义、哲理、修证、社会作用、现实意义,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一些总体认识和看法。

我一直不太愿意把已发表的文章集结成册出版。一则,我觉得这些文章都只是个人对某一问题的一时理解和心得,写出发表后也就过时了,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了(不辜负学术会议组织者和论文集编集者的盛情厚意),有多少人看到这些文章没有什么关系。二则,我觉得现

现在的年轻人做学问实在太苦了,社会、学术界都要求他们要把已有的研究成果都收罗穷尽,不管有没有价值,要看那么多别人嚼出来的东西。我那些发表在叽里咕儿里的文章,没找着也就算了,一旦集结成册出版就非看不可了,这不是给年轻学者又平添一负担吗?三则,我一向主张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们对同一问题有相同的看法是极其正常的事。所以,我常跟学生讲,你如果经过研究后有和我相同的看法,你尽管直接发表,不必要说明引自我的那篇文章、那次讲课,因为这里同样有你的研究付出。因此,我在这里必须声明,把我已发表的文章集结出版绝没有“立此存照”,维护“知识产权”,而剥夺他人同心同理的意思。

对于学术研究,我一贯主张要从第一手原始资料入手,认真深入地阅读、体会,融会贯通,直接与被研究者对话,得其意而遗其言,只要真正是自己的心得,不必虑其是否已有他人言及。

承宁波宝庆寺朗宇法师的盛意资助出版我的这本论文集,又承黄夏年同志督促和负责为我编辑这本论文集,对此我表示衷心地感谢。对于读者,我只希望大家读读这篇前言,理解我的心意,至于其中的文章随便翻翻就可以了,不看也没有关系,因为实在没有多少“创新”的东西。

楼宇烈
2003年6月

前
言
佛
教
论
文
集



目 录

总序	朗宇 1
前言	6
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	1
中国近代佛学的振兴者——杨文会	35
东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观世音灵验故事杂谈	63
胡适禅宗史研究平议	87
敦煌本《坛经》、《曹溪大师传》以及初期禅宗思想	107
杨度的“新佛教论”	127
太虚与中国近代佛教	137
禅悟的认识论意义	151
佛教与现代人的精神修养	163
禅的生命,禅的正受——读耕云先生《安祥集》	173
中国近现代佛教的融和精神及其特点	179

圆瑛大师的佛学思想	207
神会的顿悟说	221
禅宗“自性清淨”说之意趣	243
《法华经》与观世音信仰	279
中国的佛教与儒教	291
读慧海《顿悟入道要门论》随记	319
“无我”与“自我”——佛教“无我”论的现代意义	339
略论印光大师的念佛法门	347
中日近代佛教交流概述	361
佛教的人文精神与人间佛教	377
大乘不二法门的理论与人间佛教	385
佛教造像的教化功能及其艺术价值	395
佛经通俗宣讲稿本——读敦煌遗书中“讲经文”札记	413

楼宇烈

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



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

在谈到近代中国哲学时,人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及哲学社会科学,即所谓“西学”、“新学”的传入,对近代中国哲学发展所发生的重大影响。因此学术界对于西学与近代中国哲学关系的研究比较多。诚然,西学对近代中国哲学所发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需要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而且就目前情况看,研究也还是不够的。但是,我认为,在探讨近代中

* 原载于《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1期。原稿前有内容提要:“本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以大量史料揭示了佛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广泛影响,认为探讨佛学与近代中国哲学的关系,是一个极重要的课题。第二部分从把佛学与西学相附和,强调佛学的哲理性,提倡佛学应务救世的实际作用,以及唯识学的复兴和发展等方面,分析了近代中国佛学的主要特点。最后部分,作者结合近代佛学得以振兴的原因,从理论意义和社会实际作用两方面,探讨了如何正确评价近代佛学的问题。”

国哲学时,也还必须充分注意到佛学对近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大量的历史资料说明,佛学在近代中国哲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对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中国近代佛学的开展,并不是中国古代佛学的简单延续,而是伴随着西学的输入而重新振兴起来的。它受到当时西方研究佛学风气的影响,是在相当程度上揉和了西学内容和方法的佛学。近代佛学的兴起,最初为一部分思想家看作“西学”可接受的某种理论上的联接点。他们一方面或认为西学的某些理论内容和方法,包含在佛学中,与佛学相一致,而佛学则是我国人们所熟悉的传统文化(如梁启超曾说:“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就是佛教。”《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另一方面或认为,佛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比之西学更为丰富和深刻,而可用之于改造和发展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正因为如此,研讨佛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种时代潮流。许多著名的进步思想家、学者,都对佛学研究饶有兴趣,并受到很深的影响。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所说的:“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因此,探讨佛学与近代中国哲学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如果只注意到西学的影响,而忽视佛学的影响,那是不可能深入了解近代中国哲学的全貌和特征的。本文想就佛学在近代中国哲学中的影响、特点,及其意义等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和分析,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关注和研究兴趣,同时也希望得到同行们的指教。

一、近代佛学的振兴及其对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广泛影响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至南北朝隋唐,达到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后即走向衰落。其间虽时有所谓“中兴”,然自五

代至于清末,总的趋势是日益没落了。到了近代,随着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和“西学”的传入,同时受到当时欧洲学者研究佛教的兴趣和风气的影响,也带来了佛学的振兴。推究振兴近代中国佛学事业者,当自杨文会始。

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安徽石埭人。他出身仕宦之家,但少年时即不喜举子业,性任侠,好读奇书,对当时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工程技术等也甚有兴趣。中年后,他专心于佛学,深感佛教典籍佚失严重,给深入研究佛学和弘扬佛法带来极大困难。于是,他集合同志在南京创立了金陵刻经处,亲任校勘,重刻方册藏经。一八七八年和一八八六年,他前后两次随曾纪泽和刘芝田出使欧洲,考察英法等国政治、经济,研究天文、地理等。在第一次赴欧期间,他于伦敦结识了日本学僧南条文雄。以后,在南条文雄的帮助下,从日本、朝鲜访得许多我国宋明后佚失的佛教各派重要典籍,陆续刻印出来,引起了人们研究佛教各宗派的兴趣。同时,杨氏以金陵刻经处为据点,与四方学人研讨佛学,后又创办了“祇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亲自讲学,为振兴佛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材。杨文会本人在佛学方面是“教宗贤首(华严),行在弥陀(净土)”。但他对门下弟子则各就其所长而引导之,不强求以一家一说,因此,其弟子如谭嗣同、桂柏华、黎端甫、梅光羲、李证刚、欧阳渐、释太虚等,都各擅一家,有独到的造诣。杨文会对当时资产阶级的变法革新运动是同情和支持的,与当时一批社会革新人士有密切的往来,因而许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如梁启超、沈曾植、陈三立、夏曾佑、宋恕、汪康年、章太炎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佛学的影响。

杨文会逝世后,他的弟子欧阳渐(竟无)、陈镜清(释庵)、陈义(宜甫)等先后继续主持金陵刻经处事业。欧阳渐以后又

创立了“支那内学院”，释太虚则先后创办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培养了一大批佛学研究的专门家，对中国近代佛学的发展和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对近代社会思想界和学术界也产生不小的影响。

以下我想列举一些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与佛学关系的情况，这也许会加深我们对佛教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影响的感性认识。

近代中国哲学开端于资产阶级改良派，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思想代表，无一不受佛学的影响。如：

康有为(1858-1927)，早年“于海幢华林读佛典颇多”，又曾居西樵山白云洞“专讲道佛之书”(《自编年谱》)。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说：“先生于佛教，尤为受用者也。先生由阳明学以入佛学，故最得力于禅家，而以华严为归宿焉。”而在讲到康有为西樵山这段生活时说：“既又潜心佛典，深有所悟，以为性理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必探本于灵魂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常彻数日夜不卧，或打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相，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殆如世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慨。先生一生学力，实在于是。”梁启超此说不免有过实之处，但它确实也反映了康氏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康氏并没有一篇专门论佛学的著作，但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经常引用佛说以为比类，可以看到佛学的影响。如他著名的《大同书》一书，一开始就标出“入世界观众苦”，历叙人生入世种种之苦达三十八种之多，正是袭用了佛教鼓吹出世主义常用的说教。在书中，他还说：“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乐免苦而已，无他道矣。”这也正是佛教对人生的一个基本

看法。再则,康氏在行为上,也一直以释迦牟尼为榜样。他自述道:“其来现也,专为救众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人地狱,不投净土而故来浊世,不为帝王而故为士人。……故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舍身命而为之。……以是为道术,以是为行己。”(《自编年谱》)。

梁启超(1873 - 1929)早年即对佛学有浓厚兴趣。虽说“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论著,往往推挹佛教”。(《清代学术概论》)一八九九年,他在《自由书·惟心》一文中,即鼓吹佛教“三界惟心”之说为真理。他认为:“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是以豪杰之士,无大惊,无大喜,无大苦,无大乐,无大忧,无大惧。其所以能如此者,岂有他术哉?亦明三界惟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隶而已。苟能知此义,则人人皆可以为豪杰。”一九二〇年,他游历欧洲回国后,更专注于佛教研究,发奋要编著一部中国佛教史。因此,他系统地研读了大量佛经,还曾一度到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唯识法相学。以后,他陆续写出了一批佛学研究的论文(后来汇集为《佛学研究十八篇》一书)。这些论文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研究佛教史的重要成果,其中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经过这番研究,梁氏对佛学理论更为推崇。他认为:“佛教是建设在极严密、极忠实的认识论之上”的,是“以求得最大之自由解放,而达人生最高之目的者也”。(《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又说:佛学“对于心理之观察分析,渊渊入微”,“若论内省的观察之深刻,论理上施设之精密,恐怕现代西洋心理学大家还要让几步哩!”(《佛教心理学浅测》)他以至声称:“佛教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氏在人生观、生死观等问题上,十分推崇佛教的“业力”说和“唯识”说。晚年,他在给女儿梁

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

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 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 论文集